

十年来的新经济学

[美] 詹姆斯·托宾著

商 务 印 书 馆

7-12

十年来的新经济学

〔美〕詹姆斯·托宾著

钟淦恩 译

朱 泱 寿进文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0·北京

James Tobin
**THE NEW ECONOMICS
ONE DECADE OL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1972

十年来的新经济学

〔美〕詹姆斯·托宾著

钟淦恩译

朱泱寿进文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3 1/8印张 61千字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7,300册

统一书号 4017·212 定价 0.27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詹姆斯·托宾是美国新凯恩斯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47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起任耶鲁大学教授。在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内,于1961—1962年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1971年曾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本书是汇集他在197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的演讲稿出版的。除本书外,作者的其他主要著作有《经济学论文》两卷、与诺德豪斯合著的《增长过时了吗》(1972年)等。

托宾所谓的“新经济学”就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美国凯恩斯主义,按照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新古典学派的综合”。它因袭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从 $\text{收入} = \text{消费} + \text{投资}$ 这一公式出发,企图通过财政、货币政策调节、干预经济,“摆脱”经济危机,实现所谓的充分就业的均衡和经济的“稳定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加剧,美国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于是,“新经济学”被提高到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的高度,其具体表现就是用实行赤字财政的办法来刺激经济、“缓和”危机。

在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发生了1953—1954年,1957—1958年和1960—1961年三次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危机,艾森豪威尔在1957年12月13日危机严重关头,

放弃了一向认为是健全财政政策的标志的平衡预算原则，明确宣布采取赤字预算政策。但是这时的赤字财政政策还是补偿性的。这就是说，在经济危机和萧条时期实行财政上的大量超支，而在经济上升时期则尽量保持财政上有结余，目的在于减少危机波动的幅度。当时对于预算赤字还看成是非同小可的事。因此，在艾森豪威尔八年任期内还有三个财政年度有财政结余。

肯尼迪在1960—1961年的危机尚未结束时继任美国总统。当时美国经济继续在衰落下去。1953年到1960年美国实际国民总产值平均每年只增长百分之二点五，西德、法国、意大利、日本和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大大地超过了美国。

肯尼迪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以阴郁的语调承认美国“目前的经济情况是令人不安的。我们是在经过七个月的衰退、三年半的呆滞、七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九年的农业收入下降之后就任的。”面对美国经济的困境，当时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新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海勒，在托宾的赞助下，向肯尼迪献策，提出了通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来刺激经济的“增长政策”，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价格相对稳定可以并存，把1961年以后美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率定为百分之三点五，把1955年的实际国民总产值作为潜在的国民总产值的基准（该年美国失业率为百分之四，按照凯恩斯关于失业的定义，新经济学家们认为失业率下降为百分之四时，就达到了“充分就业”水平，因此，从理论上讲，该年的实际国民总产值就完全实现了该年的潜在

的国民总产值)，再按百分之三点五的潜在的增长率，推算出1961年以后各年的潜在的国民总产值。只要两年的实际国民总产值小于其潜在的国民总产值时，“即使在经济上升时期，也必须继续执行经济扩张政策”。这就是说，实行“增长政策”时，赤字财政应成为常规手段。事实也是如此，赤字财政政策已成为增长政策的最大特征。

肯尼迪采纳了海勒的建议。美国实行“经济增长”政策，大力刺激经济以后，自1961年起的几年内，美国经济处于上升阶段。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借此吹捧新经济学，认为它指明了达到充分就业的增长途径。就在他们大唱赞歌的时候，美国却出现了一系列的严重危机。

到1967年，美国经济即已停滞不前，工业生产指数只增加百分之零点八，只是由于侵越战争的升级才推迟了危机的爆发，但在1969年10月仍然开始了长达二十三个月的战后第五次经济危机，失业情况严重。与此同时，财政、金融危机也空前严重起来，自1961年起到1969年止的九个财政年度中，除1969年外，连续八年都是赤字预算。长期大量的财政赤字引起急剧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在危机期间，形成“滞胀”局面。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美国国际收支连年出现巨额逆差，黄金外流、美元危机日趋严重。1971年8月15日，美国政府终于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以后又两次宣布美元贬值，导致战后初期建立起来的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制度的崩溃。美国经济陷入内外交困、不能自拔的境地。从根本上说，这是战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进一步加剧的表现，而新经济学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实

际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在美国，以往对新经济学的吹捧，现在一变而为对新经济学的非难。新经济学的声誉大为下降。本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保卫新经济学的姿态问世的。

本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评论六十年代新经济学的所谓功过。他仍然坚持新经济学的财政、货币政策能够使美国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和避免危机的论点，在理论上为新经济学辩护。他把1964年由于减税而产生的经济暂时回升的效果，作为一份功劳记在新经济学的账上，而把六十年代后期美国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归因于新经济学家们的增税建议遭到约翰逊政府拒绝。

第二部分，托宾对于批评新经济学的意见进行了反驳。他对美国激进派经济学家斯威齐等人关于新经济学是关于通过扩军备战，甚至发动战争的方式来刺激经济的论点进行了争辩，对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学派的反对意见（货币学派认为“唯有货币要紧”，反对搞“财政刺激”）也进行了还击。托宾一再声明新经济学也重视货币政策，并对美国经济学界称他们为“财政主义”者表示不满。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目前美国新凯恩斯学派同货币学派的争论大为减少，处于合流状态，说明两派的目的都是为垄断资本获得最高利润服务，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策略重点有所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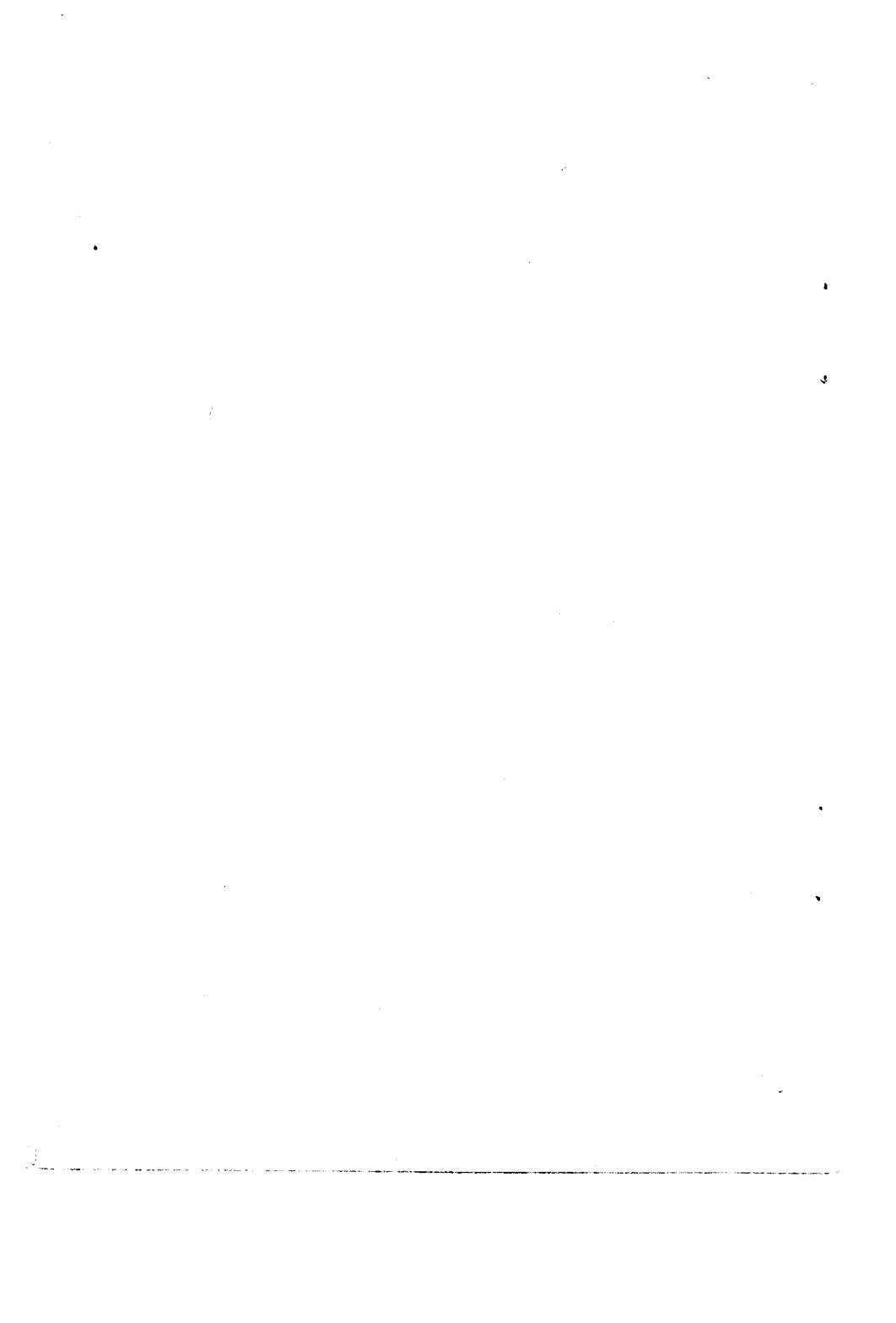
第三部分，托宾站在新经济学的立场上，继续为美国政府的决策人物出谋献策。在财政政策方面，建议今后更多地采用投资税优惠的办法来刺激经济，企图通过这项办法刺激垄断资本集团更新固定设备，采用新技术，扩大生产规模，

降低成本，以提高垄断利润。在货币政策方面，由于短期利率在资本主义世界有趋于一致的趋向，托宾建议财政部发行能够公开买卖的保证购买力的债券。名义上是控制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实际上是用来保证垄断资本的大量利息收入。他还暗示成立稳定工资委员会来压低工资水平，妄图以此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本书反映了新经济学在政策目标和政策主张方面的基本内容，美国政府实行新经济学的来龙去脉和由此引起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美国经济学界的争论以及新经济学的发展趋向。因此，我们将本书翻译出版，以供我国学术界在开展美国经济问题研究时参考。

目 录

序言.....	3
1. 六十年代的胜利与失败.....	6
2. 左右夹攻.....	38
3. 宏观经济政策的前景.....	66
结束语.....	87



序 言

1972年春，我很荣幸地在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为詹韦讲座的头几讲讲课。对这次邀请，我很感谢迪安·刘易斯院长和这个学院的全体教员。这次邀请给了我机会可对美国过去十二年来宏观经济政策作些回顾。

埃利奥特·詹韦先生亲自聆听了第一讲，为之增色不少。他曾对学院明白表示过，他对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约瑟夫·A·熊彼特思想影响的讲课人是很欣赏的。对这种喜爱我不知道我能够满足多少，但我完全同意詹韦先生对熊彼特的热情赞扬。他是我的老师，指导我写博士论文的导师，也是我的朋友，尽管我同他在理论上和政见上有很多不同意见。我恐怕他会瞧不起“新经济学”，但他至少总会赞同新经济学的信念：即，通常被称为美国资本主义的那个实用主义混合物是能够支持经济增长，并给大多数人带来不断增长的福利的。而且他恐怕会比那些“新经济学学者”更加不能容忍货币主义者和新左派所提出的抑制繁荣和进步的主张。顺便提一句，早在1940年，熊彼特在他的经典著作《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一书中，就曾以几乎惊人的准确性预见到了会出现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新左派运动。

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我现在得以发表我的三篇讲稿。这些讲稿基本上和过去讲课时一样，只是作了某些编辑

上的加工和少数几处实质性的修改，并加上了一些结束语。

迪安·刘易斯院长第一次表示可能邀请我去讲课时，曾建议我谈谈关于“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者、财政部和‘联邦储备系统’”的问题。我采纳了他的建议，虽然没有用他的原题。我一直对专门经济学和公众讨论经济问题时的用语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二者在实际制定政府经济政策中的相互影响非常感兴趣。

六十年代的所谓新经济学的兴起和衰落——我认为衰落只是部分的，暂时的——在经济学、舆论和政府政策这三者的相互作用中是富有启发的，第一章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回顾，是从一种承认有偏见的角度来观察的。第二章继续研究这个主题，那一章并论述了新左派和货币主义右派双方对新经济学及与它有关的六十年代各种政策的喧嚣一时的攻击。攻击是从新左派和从货币主义右派两方面来的。在第三章中，试图从过去十年的经验中吸取一些教训，目的是使以后的经济稳定政策引以为鉴。

我在耶鲁时的大学生研究助手詹姆斯·普加什曾帮助我准备了这些讲稿。沃尔特·赫勒帮助我回忆了某些历史——沃尔特对我的教益是多方面的，我大大受惠于沃尔特的决不限于这本书。在修改讲稿准备发表的过程中，里查德·利普西提出的一些有价值而敏锐的建议，使我获益不浅。对于他的帮助我谨在此表示谢意，因为他是1966年1月我在埃塞克斯大学给诺埃尔·巴克斯顿讲座讲授“在美国经济政策制定中的智力革命”时的东道主之一，内容包括本书第一章中所考

察的某些材料。最后，对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桑福德·撒切尔提供的许多帮助，也一并表示谢意。

詹姆斯·托宾

1. 六十年代的胜利与失败

当时和现在的经济学及舆论

虽然卡梅略^①仅仅是十年前的事，但它已经唤醒值得数十年沉痛怀念和回顾的修正了的历史。从1960年到现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都经历了巨大变化，而所有这些变化几乎是没有预料到的，如果还不是无法预料到的话。国家政策也发生了变化，而且常常是剧烈的变化，同样，用以阐述、讨论和决定政策问题的那种分析和估价的基本方法也发生了变化。

在政治经济学中，回到卡梅略时期，就等于回顾另一个时代，那时“增长”是个好词儿，的确是个好词儿；美元贬值是不可想象的；自动化既点燃了人们的希望之火，又使人望之生畏。贫穷和不均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污染就更没有人注意了；保护贸易主义如果不是完全禁止的话，也是一种需要加以辩解的罪恶行为；菲利普斯曲线只有在经济杂志中才能看到；出现预算赤字是个了不得的问题，艾森豪威尔的一百二十五亿美元的赤字已经是最高记录了；而货币数量说只是经济思想史课程中谈到的原始学说而已。

^① 卡梅略(Camelot)是传说中的英国一个城镇的名称，在其中有英王阿瑟的宫廷和宫廷中圆的办公桌。根据本书前后文看，作者是将此作为象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主要是肯尼迪—约翰逊任总统年代的美国经济，这一经济的一些特点，在本章第二节中有说明。——译者

在干预经济的年代里，象经济本身一样，美国经济学界在舆论中的信誉也经历了起伏的变化。1960年和1961年，经济学界在舆论中的信誉是低落的。1952年，反对新政的潮流把艾森豪威尔推上了台，在这一时期，政府部门内和学术单位内的经济学家遭到了普遍的憎恶和不信任，这一点在工商界表现得尤为强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学家在政府中制定政策的作用被降低了——但阿瑟·伯恩斯^①是显著的例外——而且政府讨论经济问题时很少征求他们的意见，也很少听到他们发表意见。

六十年代这种情况则发生了引人注目的一百八十度的变化。例如沃尔特·赫勒^②的被重用，1960年以前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学者，除了经济学界和他的家乡以外，很少有人知道他。肯尼迪刚刚任命他的时候，还有人指责他在战争刚结束时向新成立的西德政府提出的建议是典型的“新形式”建议，既不现实，又不稳妥。但现在，工商界的领袖们、工会团体、银行家会议、各种国会委员会和政治候选人却都争先恐后地请他进行预测，请他判断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在赫勒的个人威信提高的同时，公众对整个经济学界的评价却普遍下降了。六十年代中期正是经济学家心中充满热情、满怀信心的最盛时代。看他们的样子好象掌握着别

① 阿瑟·伯恩斯在非政府职务方面担任过全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主任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1953—56年出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69年，他作为尼克松总统的特别顾问重返华盛顿，1970年被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② 沃尔特·赫勒担任1961—64年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非政府职务方面曾担任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授。

人不知道的分析方法和政策，而他们提出的政策似乎也还奏效。当时至少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各种问题和争论都被当作了技术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问题来看待。1962年，肯尼迪在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他的著名演说时，曾恳求心怀敌意的听众对经济政策的实用主义探讨，采取接受态度或至少允许别人抱这种态度，抛弃那些自1936年以来严重影响工商界和金融界态度的情感、口号、神话以及过时的信仰。其实在两三年以后，对于参加耶鲁毕业典礼的听众，甚或在一次普林斯顿校友会上，他的这番话也许会更容易被人接受。

在外人看来，经济学界似乎很团结，堪称一个由技术人员和实用主义者组成的行会。当然，内部是存在着意见分歧的，但很少外露。当时货币主义者正在摩拳擦掌准备战斗，但是他们的宣言尚未在《新闻周刊》出现。老的左派经济学家和老的右派经济学家，他们的见解都好象是过去一代的呼声，而新的左派经济学家和新的右派经济学家，直到六十年代后期爆发了青年人的骚动以后才成为强有力的知识分子反对派。就是J.K.加尔布雷思这个向传统理论不断提出挑战的人，也因为自己担任了政府职务而在六十年代初期暂时放弃了争论。当时生态学家也还没有因为所谓经济学家只崇拜国民生产总值而不关心人类和其它物种的生存，而向他们发起攻击。

自然，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了。经济学家作为实用主义专家而受到的短期尊敬已经不复存在。他们的意见分歧已经张扬在外，而他们的错误也是尽人皆知的了。经济学界变得更加讲究意识形态，而且对于自己提出的种种前提和方法丧失了信心。在美国经济协会最近召开的各次会议上，受到热

烈鼓掌欢呼的是那些说我们如何废话连篇、错误百出的人。

新经济学的主要思想

肯尼迪的经济顾问委员会^①和这位新总统身边的其他学究气十足的经济学家给华盛顿带来的经济学，对于经济文献和课本来说，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在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和英国各国政府的实践中，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同样，对于我国的官方经济学说，也没有带来多少新东西。我国的官方经济学说是在杜鲁门任总统的时候由爱德温·诺斯和利昂·凯塞林分别担任主席的头两届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来的，后来艾森豪威尔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对其进行了补充。

然而，它对华盛顿来说却是新东西。因为它对经济政策采取的态度，同过去八年联邦储备系统、联邦各官僚机构，特别是财政部所死抱住不放的态度相比，有很大不同。对于出版界来说也是如此，不论是华盛顿采访记者、金融消息记者，还是政治评论员都感到新奇。正是他们创造了“新经济学”这个词，他们显然不懂经济理论和历史，毫无疑问，对西摩·哈里斯^②在1947年编著的那本关于凯恩斯经济学的书也是一

① 肯尼迪的第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由委员会主席沃尔特·赫勒、凯密·戈顿和我组成。1962年8月我返回耶鲁大学，由贾顿·阿克莱接替我。但此后好几年我一直同该委员会保持着密切的咨询联系。

② S.E.哈里斯编著：《新经济学》（纽约：克诺普夫，1947年）。就我的研究助手詹姆斯·普加什所能查阅到的材料来说，把“新经济学”这个词与赫勒和肯尼迪政府联系起来，最早见于1962年7月16日《新闻周刊》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标题是《问题：减税是国家需要的吗？》。文章写道：“注重预测和控制经济周期的赫勒牌‘新经济学’，虽然会在政府中风行一时，但它并没有对参议员伯德产生丝毫不利影响。……”